



孟祥霞 江彦 著

近代中国金融制度变迁中的 甬商与晋商比较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孟祥霞 江彦 著

近代中国金融制度变迁中的 甬商与晋商比较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金融制度变迁中的甬商与晋商比较研究 / 孟祥霞, 江彦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2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

ISBN 978-7-5203-3736-6

I. ①近… II. ①孟…②江… III. ①商业史-研究-宁波-近代②晋商-历史-研究-近代 IV. ①F7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8848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1
插 页 2
字 数 369 千字
定 价 8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

主 任：车 俊

副主任：葛慧君 郑栅洁 陈金彪 周江勇

成岳冲 陈伟俊 邹晓东

成 员：胡庆国 吴伟平 蔡晓春 来颖杰

徐明华 焦旭祥 郭华巍 徐宇宁

鲁 俊 褚子育 寿剑刚 盛世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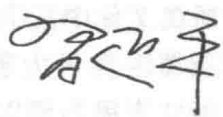
蒋承勇 张伟斌 鲍洪俊 许 江

蔡袁强 蒋国俊 马晓晖 张 兵

马卫光 陈 龙 徐文光 俞东来

陈奕君 胡海峰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

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藉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养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

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传统文化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

引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

前 言

—

作为名列中国近代十大商帮之中的晋商与甬商，其崛起和兴盛都有某些共同性。但由于两个商帮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环境的差异，故又有各自的独特性。晋商曾作为我国历史上享誉盛名的商帮，在历史上取得过辉煌的成就，在中国近代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最终都未能改变自己随着清王朝的衰亡而衰败的命运。甬商从形成到兴盛的时期虽晚于晋商，然而近代则是甬商的大发展时期。

发迹于 15 世纪末的晋商，到 16 世纪 70 年代进入它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大清帝国”在嘉庆以后就渐显衰象，至道光年间，特别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便江河日下，气数殆尽。然而，晋商这支活跃于明清两代的强劲商旅却没有因为清政府的衰微而一蹶不振，反而在道光初年创建了票号，晋商从商贸领域挺进金融领域，并在此后的七八十年间，奇迹般地创建出晋商史上的又一个辉煌鼎盛时期。

票号诞生后，特别到咸丰以后，晋商（贸易商和票商）上通清廷，下结官绅，商路遥达数万里，款项汇通天下。南至中国香港、加尔各答，北上莫斯科、彼得堡，东延东京、神户、大阪，西到阿拉伯国家，到处都有晋商的踪迹。在国内，虽然外国银行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末就已建立，且规模和覆盖面在不断扩大，但一直到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山西票号仍稳固地占据着中国金融市场，其资本之雄厚，覆盖面之广大，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可谓名震中外，汇通天下，显赫异常。

从 19 世纪 80 年代上海股市风潮起到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由于复杂的

历史原因,晋商地盘日渐萎缩,经营日渐艰难,最终山穷水尽,随着票号的消亡而走向衰落,悄然退出历史舞台。由兴到盛,盛极而衰,晋商纵横捭阖,称雄华夏商界近500年,在中国金融史上涂下重重的一笔!

晋商的衰落,既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也受制于自身的诸多局限。董继斌在《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一书中概括出这样几点:其一,国势衰微,百业凋敝。清王朝的迅速垮台,使晋商(尤其是票号业)受到沉重打击。晋商长期与清廷结托,致使票号中大量存放官银,在风雨飘摇中的清廷官员,对票号“存款立提,毫不通融;放款不还,人去楼空”,山西票号因此而倒闭者,十有七八。其二,清廷官银钱局及中国通商银行、大清银行、交通银行的相继成立,在业务上夺走了票号的地盘,加上外资银行的挤压,使山西票号在内外夹击中日趋萎缩。其三,墨守成规,故步自封,使票号始终带有浓厚的封建局限性,在与资本主义银行的竞争中显然处于劣势。其四,晋商作为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运营者,在剩余资本的投向上始终存在战略性失策。晋商的资本积累大都用在购田置地,修建庄园,捐输助饷,结托官府,剩余部分或者窖藏或者奢侈浪费。他们很少将资金积累转向产业资本,在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晋商的发展背离了社会潮流,单一的资金投向失去了风险抵御能力,其消亡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甬商的产生和发展首先与作为著名对外贸易以及沿海贸易港口的宁波港有密切关系。良好的港口,便利的交通,发达的传统商业,为甬商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清朝乾嘉时期是甬商由一个普通的地域商帮,一跃发展成为紧随徽帮、晋帮、粤帮、闽帮之后的又一个国内著名商帮的重要时期。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后,国内主要的商帮已经由徽、晋两帮南北对峙,演变为晋商、粤商、闽商、甬商四强争雄的局面。

甬商第二个大发展时期是鸦片战争后的数十年间。中国封建社会经过两千余年的发展与不断修复,在其内部调节机制的作用下,已走到了封闭和近乎停滞的境地,很难依靠自身力量来进行社会的更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在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同时,也使“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①,它改变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自我循环历程,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8页。

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 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在这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甬商凭借自身特殊的有利条件，迅速介入新兴的对外贸易领域，并形成了以买办商人和进出口贸易商人为代表的新式商人群体。由于闽商在鸦片战争后衰落，甬商与粤商、晋商在中国商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任何一个商帮，如果没有自己的金融业，就难以形成一个贸易体系，难以为其商业活动提供后援力量，也无法维持商业的长期繁荣。甬商的钱庄业自明清时就已有相当的发展，“信用最著，流通亦广”，其独创的“进出只登账簿，不必银钱过手”的过账制度以快速、方便而闻名全国。清同治年间，宁波即有拥资数万可以直接过账的大钱庄 36 家。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甬商所经营的钱庄便执上海钱业之牛耳。当时上海形成的 9 大著名钱庄资本家集团中，甬商就占 2/3 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除上海外，甬商还在北京、天津、沈阳等地开设钱庄和设立分店，使全国各地钱庄声气衔接，形成一个巨大的汇兑网。五口通商后，外资银行纷纷进驻上海滩，“银行始初仅通洋商，外洋往来以先令汇票为宗，存银概不放息”。^② 初期大部分中国商人与钱庄的关系远甚于银行，同时外资银行由于在内地并无分支机构，其汇兑业务反而要委托钱庄来办理。外国银行要扩展业务，必须适应市场与钱庄发生关系，因此钱庄庄票被外资银行广泛接受。“钱庄庄票能在洋行出货，外人极信赖之银行钞票无此本能。”^③ 然而，外资银行与钱庄的合作只是暂时的，其维系机制是在市场浅层发育时两者利益的共享性——银行拥有资金，钱庄掌握广泛的业务关系，彼此互补，各得其所。而待市场发育和竞争深化至某一程度时，这两种本质冲突的异质组合就会发生必然的分化。而且，由于规模、制度上的优势，外国银行在这种“合作”中处于相对的主导地位，当它在中国站稳脚跟、羽翼渐丰时，钱庄的依附性就越来越凸显出来，也就越来越难以适应日益复杂的近代经济生活。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社会对于通过银行获得大规模融资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经营钱庄的宁波商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5—36 页。

② 1884 年 1 月 12 日《申报》（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③ 马寅初：《银行之势力何以不如钱庄》，《东方杂志》第 23 卷第 4 期，1962 年 2 月。

人很快便意识到这种发展只能适应前资本主义的贸易活动，经不起金融风潮的袭击，终将被现代银行所淘汰。对新兴事物素来极其敏感的甬商于是开始积极主动向近代金融业转化和渗透。

甬商的第三个重要发展时期是 19 世纪 80 年代，特别是 90 年代以后。其主要特征是以新式商人为主的宁波商人将商业利润投资于新式银行、轮船航运、现代工业等新兴实业领域，形成了实力雄厚的甬商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产生了近代影响广泛的金融家、企业家群体。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甬商在经营形态和商帮性质上已由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商帮，转变成为一个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集团，并成为以上海为中心、江浙金融资本家为核心的中国近代主要商帮。

近代金融业的形成大致有两种途径，“一是 19 世纪末旧式钱庄的资本主义化；二是世纪之交近代银行的出现”^①。旧式钱庄的资本主义化，首先是旧式钱庄对新式银行的依赖与联系越来越密切；其次是钱庄资本与近代工商业开始紧密联系、共同发展。甬商钱庄业把通过各种渠道积聚的资金转化为近代工商业资本，而且在国内外贸易中起着金融枢纽的作用。钱庄资本与新式工商业的结合表明，甬商钱庄业已逐步演化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金融机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放，甬商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主动以“领头羊”之雄姿率先向近代化转型。甬商经营的钱庄、银号、典当等旧式金融业逐渐向银行、信托投资、保险、证券等近代金融业转化。在近代银行业中，甬商长期控制着中国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另创办有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垦业银行等近代著名银行。在近代轮船航运业中，甬商商人创办了戴生昌轮船公司、宁绍轮船公司、三北轮埠公司等中国近代著名的轮船公司。在近代工业企业中，有刘鸿生企业集团、三友实业社、中国化学工业社、五洲药房、信谊化学制药厂、民丰华丰造纸厂、大中华橡胶厂等著名大中型民族资本企业。在创办和经营近代企业的过程中，甬商工商业者中产生了诸如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宋炜臣、虞洽卿、刘鸿生、周宗良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近代著名的企业家。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以甬商为中心的江浙财团南移香港。此后有一批甬商工商业者移资海外各地，但大部分工商业人士此后以香港为中心继续发展，并与此前移居海外各地的甬商一起，被称为现代海外甬商。

^① 姚会元、邹进文：《“江浙财团”形成的标志及其经济、社会基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

在近代中国众多商帮中,“甬商”不仅历史悠久,经济实力雄厚,而且是唯一一个实现了集团性或群体性近现代化转型的商帮。甬商在其发展过程的各个重要时期,实现了集团性的多次转变或转型,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商帮的转型更为深刻,使得甬商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不仅没有衰落,而且由一个传统商帮最终成功转型为一个近代工商金融业集团,推动了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和金融制度的近代化变迁,对中国近现代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

如果站在 1840 年的时间坐标原点上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西方世界的兴起是在二百多年间实现的,而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被西方世界超越更只是发生在英国工业革命后不到一百年里的事情^①。15 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总体领先于西方,在科学技术领域的优势尤为明显;直到 16—17 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各项基本指标,比如人口增长率、人均 GDP 和生活水平、工业化程度、市场规模和运作状况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等,似乎不逊色于西欧,在一些重要领域甚至比西欧表现得更为出色。而在 1840 年之后的百余年里,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外交上和思想文化上,都走过一段相当艰难坎坷的路程。时至晚清时期,国人深刻感受到了来自物质和精神领域巨大的双重落差。而造成这种落差的根源是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的经济实力,特别是经济增长速度,被西方世界远远地甩在后边。

17 世纪中叶后,西方世界爆发了一系列惊天动地的伟大革命,历史的车轮突然间加速前进。而处于全球变局中的中国,此时正陶醉在康乾盛世的古老文明之中。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封建统治者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愚昧,封建君主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墨守成规,反对变革,最终使中华民族在不到 100 年的时间里由世界经济中心沦为任人宰割的弱国。广阔的中

^① 1820 年时,中国与欧洲的 GDP 总量相差不远。麦迪逊估算 1820 年的世界 GDP 总额为 6352.89 亿美元;欧洲约占世界 GDP 总额的 35%,为 2224.26 亿美元,中国约占世界 GDP 总额的 31.4%,为 1992.12 亿美元。罗兹·墨菲从总量的角度对东西方做了一个综合评估。他得出的结论是,大概从 17 世纪末开始,西方国家的总体实力呈上升趋势,这与亚洲主要国家出现的下降趋势在时间上基本吻合。最后,一条代表西方国家总量的上升曲线和一条代表亚洲国家总量的下降曲线在 1815 年的坐标点上交叉,而欧洲与中国的相交点又比 1815 年稍晚一些。参见 Madison, Angus, 1995; Murphey, Rhoades, 1977, *The Outsiders: Western Experience in India and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 5。

国市场和巨额的对华贸易逆差,使中国成为贪婪的西方列强的必夺之地。以农业手工业为基础的清王朝毕竟抵挡不住先进大工业生产的“坚船利炮”的攻击,两次鸦片战争使西方列强夺走了中国市场,也夺去了中国人的尊严,使中国人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社会中挣扎了近一个世纪。诞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下的中国近代金融,不仅屈从于封建势力的统治和盘剥,而且受制于西方列强的挤压和掠夺。

中国近代金融是中国近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外化,从金融组织到货币制度都标识出它鲜明的时代特征。在金融组织上,中国银行业起步较晚,如果将具备现代银行要素的票号作为中国早期的银行业,那么,它的诞生虽然比中国第一家以“银行”命名的金融机构——中国通商银行早 70 多年,也比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外国银行——丽如银行早 20 多年,但是,它比西方的威尼斯银行晚了 240 多年,比世界上首家股份制银行——英格兰银行晚 120 多年。在货币制度和形态上,中国长期实行银两和制钱并用的复本位币制,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19 世纪中叶前,世界各国先后都放弃银本位制,实行金本位制。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世界上只有中国、西班牙、墨西哥实行银本位制。本位币制直接影响到商品贸易,落后的本位币制,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旧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落后的银本位制下,流通中的货币也十分混乱,有制钱、银两、自铸银圆、外国银圆,还有纸元(钞票),既有钱庄、银号发行的钱票、银票,又有清政府一度发行的官票和宝钞,以及在华外国银行发行的兑换券。1900 年起,又流通铜圆。币制及货币发行的落后与混乱加上金融管理的无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 19 世纪中叶震动全国的福建金融风潮。作为兼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商帮群体,面对如此芜杂的金融环境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恶劣社会环境,能够顽强生存还有所发展,甚至将 500 年商帮的辉煌发挥到极致,晋商创造出了奇迹。对于晋商何以在国力衰败、兵荒马乱的年代创造出如此奇迹的问题,董继斌在《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一书中进行了解读。

第一,票号资本的二重性适应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环境。票号资本作为生息资本,在近代社会经济环境中兼有高利贷资本和银行资本的两重性。作为高利贷资本,在适应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环境时,它不得不以现代金融的面目出现,非如此不足以抗衡外资银行的挤压;而作为银行资本,在封建势力的氛围中它又不得不同时具备与其现代金融本质相反的特质。正是这种二重性,使山西票号在长达七八十年的时间内,在西方列强和封建势力的夹缝中穿梭运行,游刃有余。

第二，晋商与清廷之间非同一般的结托关系。晋商与官府之间的往来在明代就有。到了清代，特别是票号诞生后，这种结托关系达到空前的程度。票号以官府为后盾，信用虚增，官府以票号为附庸，聚敛财银。最后发展到票号只对官银和巨商开放，不与中小工商业业务往来，从而为其迅速衰落埋下伏笔。

第三，把握商机、充当清廷的财政工具。战争给人民带来苦难，却给商人带来一些机会。晋商凭借与清廷的关系，紧紧抓住鸦片战争、白莲教起义、义和团运动、捻军起义出现的商机，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饷、协饷，筹措汇兑抵还不平等条约形成的对外赔款，还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俨然一副清廷总出纳的模样，其间晋商所得利益是不言而喻的。

第四，严谨的经营作风和引进、创新的金融制度。晋商素以进取、敬业、谋略、商德而著称，明清几百年商海搏杀和经营作风的积淀，使晋商能够积财如山而崇尚节俭、处变不惊，靠严谨的经营作风和不违封建伦理的商德商誉在动乱的清朝中晚期创造出商界奇迹。在金融制度上，或是引进或是创新，山西票商具有了现代金融的雏形，它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公积金制度，风险防范金的提留、转账和异地结算、票据和贴现，汇票的防伪以及劳力和智力资本的入股等在当时都具有超前意识。所有这些不仅是它在战乱中得以生存发展的内在基础，而且使其在中国近代金融制度变迁中占有重要地位。

甬商金融业的优势地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依靠其在传统金融业——钱庄业所占的优势地位达到的。在近代，甬商钱业势力顺应时代潮流，依托外资力量，完成自身蜕变，以转型后的钱庄和银行为后盾，充分利用资金投向的改变，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成为近代中国经济生活中极为重要的金融力量，尤其在近代中国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其作用更不可或缺。

银行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经营货币资本、充当债权人和债务人中介的最重要现代金融机构。与晋商相比，甬商的实业家对银行职能的理解更为深刻，而且行动积极。山西票号对新式银行兴趣不大，而宁波钱庄却能把握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顺应形势发展，以积极、能动、进取的姿态，投资近代银行，创办新型事业。由此可以窥见，甬商能在晋商之后迅速崛起并经久不衰的根源。

1897年5月中国通商银行的创设是国人自办银行之嚆矢。在该行兴办、资金筹措、具体事务管理中处处闪现着宁波商人的身影。甬商的开山祖严信

厚，在当时开办了海关银号，在各省也设有汇号，他把这些资金投资于通商银行。从文献上看，通商银行的股东不少是甬商企业家，初创时的八位总董中，甬商人士叶澄衷、朱葆三、严信厚均为闻名上海的钱业巨子，掌握着该行的实权。先后担任通商银行总经理（华大班）的陈笙郊、傅筱庵亦是甬商钱业中的头面人物，其上海南市分行经理也由镇海籍方椒伯担任。甬商在中国通商银行中的势力和影响如此之大，通商银行因此顺理成章被归属于甬商的金融势力范围。^①

1908年，以虞洽卿、朱葆三为首的甬商人士又合股设立四明银行，这是一家完全由宁波商人投资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被视为甬商的金融根据地，慈溪籍金融家孙衡甫长期担任该行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四明银行因发展迅速、信誉良好而成为上海最重要的14家银行之一。中国垦业银行是甬商创办和经营的又一家著名银行，由慈溪商人童今吾发起成立。他与天益钱庄经理镇海人俞佐庭合伙，利用宁波本地钱庄长期放款作为大部分股本，并取得钞票发行权。孙衡甫曾一度出任该行董事长。1929年，慈溪人秦润卿、王伯元接手后，采取稳步发展的经营方针，陆续成立了储蓄所和地产部、信托部，业务蒸蒸日上，成为上海银行业中的佼佼者。

甬商还利用原有的钱庄基础、熟悉的金融业务及各种人事关系向各银行实行渗透，以掌握实权。当时较有实力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南三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等主要权力都掌握在甬商手中。与此同时，一些宁波籍商人投资的分业银行及特殊银行也相继出现。如煤炭大王刘鸿生发起组织的上海煤业银行、慈溪人秦润卿等创办的上海棉业银行等就具有鲜明的行业性质；奉化人邬挺生等组织的中华劝工银行、鄞县人项松茂等创设的宁波实业银行则属于农工银行类型；而余姚人黄楚九设立的日夜银行自上午9时至晚上11时营业，在时间上颇有特色；余姚人严叔和与鄞县人张寿镛参与创办的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在组织上颇具特色，属于特殊银行类型。^②

甬商通过投资经营新式银行，加上钱庄的近代化转型，金融势力大增。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著名银行的总行有80%以上设在上海，甬商参与投资、创办、管理的几乎涉及上海所有的重要银行，“掌握着金

^① 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10页。

^② 乐承耀等：《甬商经营理念研究》，宁波出版社2004年版，第47—48页。

融上的权力，而无可与之匹敌者”。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调查报告中指出：“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①

除银行外，宁波商人在证券、保险、交易所、信托公司等当时新兴的金融行业中更是独占鳌头。1920年，虞洽卿、盛丕华等创办上海第一家华人自办的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1921年中国第一家信托公司中易信托公司成立，朱葆三担任董事长，俞佐庭等人亦任显职；1936年慈溪人孔颂馨创立东南信托公司。保险业中，宋汉章出任中国保险公司董事长近20年，堪称保险业的元老；由宁波商人创办或经营的华兴保险公司、宁绍人寿保险公司、四明保险公司、中国天一保险公司等保险企业，在中国保险史上均占有一席之地。据有关资料统计，从上海开埠至1937年，宁波商人在沪地先后开设或出任经理的重要的钱庄、银行、保险公司、交易所就有105家。^②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沦陷后的1941年，宁波人在上海经营的钱庄仍有11家，银行17家，证券14家，保险5家。

金融机构的相对齐全意味着功能的相对完善。甬商充分利用其金融业优势，权衡利弊，掌握银根，促进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甬商的商业、钱业互相为用，以钱业支持商业，商业资金调度灵活，由此形成的经济势力不容小觑。由宁波人掌控的银行，对宁波商人借款都予以特殊照顾。正因为甬商具有商业与金融业紧密结合的特色，使得甬商在商业经营中占有资金上的优势；正因为有银行为之融通资金，甬商因而声势日盛；正因为甬商的金融实力，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得以确立和巩固。

在中国金融告别传统走向近代的制度变迁过程中，甬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促进了近代中国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推动了近代中国金融业近代化进程。其一，宁波商人不仅大规模投资于近代金融业，而且广泛引进西方先进的现代金融理念与经验，积极投身于近代金融事业的经营与管理，使得社会储蓄转化为职能资本的现代信用制度得以正式确立，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金融的近代化。其二，推动中国近代华资银行兴起，将钱庄与外国银行、钱庄与中外贸易、钱庄与近代资本主义企业联在一起，从而促使钱庄资本向近代金融资本转化，奠定了近代乃至现代中国金融体

① 《宁波帮企业家的崛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6页。

② 李斌：《上海的宁波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0页。